

不忘初心，凝聚责任（四）

1935年的中国政治形势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蒋介石继续“追剿”红军，一是日本策划了华北事变，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东北，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峻。虽然此时红军仍深陷危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分别于1935年的4月、11月开始长征），但中共中央还是对全局的政策做出了调整。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各党各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事业而奋斗。宣言里，中共对蒋政策已有微妙变化，即由“抗日反蒋”转变到“联蒋抗日”。

在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中，党中央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最先到达了陕北。当时面对的主要对手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们连同甘、宁、晋、绥等部分地方军阀部队，在南京政府的督策下以十几万人的兵力对陕北形成围攻之势。然而，这些部队均为蒋介石所排挤的“杂牌军”。特别是东北军的广大官兵由于家乡被日军侵占，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去抗日；而起自陕西关中农家子弟的杨虎城将军，则对共产党

人的主义和主张一向持有同情态度。这些都是中共争取和团结他们的重要的内在条件。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重点就是解决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进行东征，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而努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开展了高效率的统战工作：

派代表首先赴西安与杨虎城会晤，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红军派代表进驻西安，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西北大联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派李克农两次前往洛川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会谈，就停战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周恩来与张学良见面会谈，达成了互派代表、互不侵犯、东北军为红军代购军需品和中共派人协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定。同时，红军还通过对晋绥地方实力派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先后与阎锡山、傅作义、马鸿

逵、马鸿宾等达成了停战谅解。

至此，中共中央所倡导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在1936年上半年基本形成，这不仅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此时，蒋介石多年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北地区遭到了局部破产。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建立起停战合作关系，使蒋介石再逼迫他们进行“围剿”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些部队随时都可能发生倒戈或哗变”。当蒋介石自认为“这时给疲惫不堪的共产党军队，以最后一击的时刻已经到来”之际，恰恰是被共产党统战巨腕扭转了方向之时。

1936年9月，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等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文中指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致信蒋介石，表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决计不能再自相残杀，红军愿意“化敌为友，共同抗日”。11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全国上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空前高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包容、宽博的政治智慧和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历时两个寒暑，纵横

十多个省份，跨越万水千山，行程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困苦，终于胜利实现了从中国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三大主力在陇中高原胜利会师。

回首这二万五千里行程，红军自始至终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中国共产党以坚定无畏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团结人心、集聚力量，以鲜明的统战策略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虽然每个阶段的统战对象不同，统战工作内容不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在军事上分化敌军、减轻红军的压力；在政治上动员和团结各族群众、赢得理解和支持；在大局上尽释前嫌，以民族危亡为重。

漫漫征途，红军征服的是人心，获得的是坚不可摧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危局中对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对人心向背的明智判断和抉择，以及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胸怀。这股力量最终让长征走向胜利。

长征胜利了，革命才能再出发。